

我  
观  
《  
猫  
城  
记  
》

曾  
广  
灿

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创作于济南齐鲁大学（现山东医科大学），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连载于《现代》杂志。193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旋即售罄，两个月后即行再版。1947年改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1949年2月印行第三版。解放后停版。关于《猫城记》

的评论，三十年代较集中，大约有五、六篇评论文章；四十年代没有；五十、六十年代被判定为有政治倾向错误的作品，因此遭冷落；“文革”中被视为“反党大毒草”，遭受批判。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国外部分专家读者翻译并肯定这部作品。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现代文学界重新评价《猫城记》，但分歧仍然存在。①

《猫城记》问世之初的三十年代，评论界的文章肯定的是多数，同时也指出了小说在艺术性和思想内容方面的缺欠。五十年代后，把《猫城记》判处死刑的做法无疑是“左”的思潮影响的恶果；但七十年代后，某些外国评论家又把《猫城记》说的好得不得了，也恐怕是不能服人的。②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倘要论文，最好要顾及作者全人，亦即“知人论世”的方法。我想由此出发，从下述三方面提出自己对《猫城记》的看法。

一、《猫城记》与作者的关系

有的评论家已指出，《猫城记》是老舍所有作品中一部最直接、坦率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的作品。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一部作品的思想不管看似多么隐秘、客观，都不能不有一个作者的形象蕴藏其中。不能想象，一部作品可以完全没有作家的主体意识。《猫城记》所表现出来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比一般作品更强烈、更直露。那么，老舍要写这部作品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他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产儿的？

用一句概括的话回答便是，一颗可贵的爱国和关心民族前途、人民命运的心，支配老舍创作了《猫城记》。当他结束了五年多异域生活，怀着一颗美好的心回到祖国后，黑暗、落后、内忧外乱、国势衰颓的现实，使老舍大大失望了。面对危机四伏的三十年代中国现实，有的人蔽退、遁隐；有的人愤懑，想干脆让它烂透了再从中长出新的生机；有的人则决不让步，以时代斗士的姿态直面社会人生；有的虽不呐喊呼号，却默默工作，用自己的笔挖掘着旧社会的墙脚。作为一个对祖国抱着热望的人，老舍既不愿超然隐退，任神州陆沉，又绝不会附炎趋势、去弄个一官半职；现有的思想准备和环境条件，又使他难以一个时代弄潮儿的英姿置身拚杀之中。在这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的面前，他无法不陷入痛苦、失望、怨愤和追求中。这种复杂的思想情绪首先在《猫城记》中

找到突破口,仿佛只有借此一泄才能解脱几分矛盾的痛苦。他说:“《猫城记》是个恶梦”,为什么呢?“因为一肚子倒有半肚子牢骚”。这种“牢骚”显然不是个人不得志或私愿得不到满足,而是对国事前途的担忧。“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象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sup>③</sup>作家看到的是满眼的“黑暗”,所以落在笔下也只能是“但丁的游地狱。”<sup>④</sup>老舍在1934年9月曾为他的题为《鬼曲》的一首诗写过一段附记,其中说,“它是个梦中的梦。在梦里,我见着很多鬼头鬼脑的人与事。我要描写他们,并且判断他们,假如有点思想的话,就在‘判断’里。我不能叫这些鬼头鬼脑的人与事就那么‘人’似的‘事’似的;我判定,并且惩罚。有点象《神曲》中的‘地狱’。但只有‘地狱’而无‘天堂’等。”<sup>⑤</sup>这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老舍写《猫城记》的态度。但他对猫国的人民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老舍从“爱”出发,怀着“怒其不争”的感情,痛切地批评着一般猫国民众的愚昧落后。这样的主观动机,就把他与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与那些肆意诬蔑劳动人民的贵族资产阶级老爷们区别开来。读过《猫城记》的人,谁也会感到小说极为鲜明地表现了老舍爱国、热望民族富强和人民摆脱贫困、落后的强烈主体意识。

对于《猫城记》,老舍本人有一个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1933年,老舍在《猫城记》初版《自序》中,假托对二姐、外甥的发问的反感,表示了对某些人说小说

“太悲观”和给它划阶级定成分的不满。无疑,这时老舍对自己的作品是充满自信的。

1934年,他在《我的创作经验》的讲演中,提到《猫城记》,只说它是“《大明湖》的妹妹,也没多大劲”。<sup>⑥</sup>这显然是说表现上的力度不够,是写法上的问题。

1936年,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他公开承认:“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我有一块多么平凡的脑子。”<sup>⑦</sup>

1944年,在《习作二十年》一文中,老舍对《猫城记》否定的态度又进了一步,称它是“最要不得”的一部作品。<sup>⑧</sup>

1951年,在《老舍选集·自序》中,他再次否定了《猫城记》:“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sup>⑨</sup>此外,老舍还在一些地方提到过《猫城记》,不是说它创作不成功,就是说它“有错误”等。

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坛上也是风起浪涌。老舍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随之有变化和提高。他对《猫城记》的自我批评过程,一面烙印着时代影响的痕迹,一面也反映了个人思想认识的提高过程。

尽管有的作家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喜欢自吹,但依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作家的自评和自我认识材料,历来是研究作家创作的重要依据。对于象老舍这样总是严于责己的作家,就更不应忽略这一方面。

当然,我并不同意老舍自己批评《猫城记》“最要不得”的说法,至于表示后

悔、忏悔，更不必要。《猫城记》自有它出世和存在的价值。作为现代文学中聊备一格的一部作品，它确实触及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众多现象，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反思那段历史；它又确实最直率坦露了一个诚实作家的最坦诚的爱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胸怀，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老舍的思想和创作发展。

由上述可见，老舍创作《猫城记》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他的主观动机完全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爱”，是作家主观与客观现实无法吻合，因而失望、忧愤、又不无追求的产物。老舍对他的这个产儿由最初技巧上的不满，后来决定抛弃它——“以后不再版”，有时代思潮影响的印痕，也有作家本人思想认识提高之后对其中的缺欠认识更清楚的原因。

评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依据毕竟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力度和艺术价值，而不能单纯从主观动机上裁断。这样，我们就必须进入另一问题的探讨：

## 二、《猫城记》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

没有人否认，《猫城记》所批判、讽刺影射的是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我以为，从思想成就来看，如下两点是人们所不能不承认的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所在：

一是无情批判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落后面，从而否定了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

随着小说所展现的画面，我们看到猫国（它影射中国社会，这是不待解释的）从大自然——天、地、河、空气，到社会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

等，都是一团糟。“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国家危机了，当政者不是研究抵抗，而是研究投降；国家的经济命脉维系在“迷叶”——鸦片上；“教育史就是笑话史”；军队不会作战，只会逃跑或抢“迷叶”；法律“不过是几个刻在石头上的字”；文物图书被抢光、偷光、卖光；学者，不管新老，社会科学的抑或是自然科学的，全是草包、淫棍，只会沽名钓誉；群众呢，盲从、怯懦、不团结、麻木、自私……一句话：愚昧、落后。总之，小说中的猫国社会，从上到下就是这样遭透了的一个处所。毋庸置疑，作品所展示的这些社会现象，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中是有一定真实性的。特别是对大地主、政客、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蝎及其父亲的批判描写，对公使夫人的残忍及忠于封建圣贤本质的揭露与鞭笞，可说是有声有色，相当深刻，令人一读不忘，是小说最有光彩的部分。

二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国民精神的旺盛、奋进或萎靡、怯懦是一个国家民族强盛或落后的基本标志。中国由于长久背负着“文明”包袱及受封建思想礼教戕害，国民精神遂表现了衰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和抗争甚至愚昧、自私等落后现象。它拖住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腿，特别是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入侵情况下，这种精神上的弱点暴露更充分。为了除掉这个精神负担，鲁迅等伟大精神界先驱，在本世纪初便以剖切之笔对“国民性”进行解剖和批判。鲁迅的笔锋主要指向辛亥革命时期。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面貌与辛亥革命时期相比，当然有很大变化，但因为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基础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种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又有其顽固性，所以二、三十年代

的中国，懒惰、麻木、愚昧、盲从、不团结、自私等劣根性仍是一些人的精神负担。以忠实反映客观生活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和批判这种不少人身上沾染着的精神奴役创伤是理所当然的。有人仅从时代不同了，就认为再以批判“国民性”为主题写作品即缺少典型或没有时代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猫城记》在批判“国民性”上有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传统市民性格弱点的批判，可以说是老舍创作历程中一条重要的流脉。在《二马》中通过对马则仁的描写，批判了老一辈中国人的保守、中庸、自私、不求进取乃至苟安现状的落后思想；《离婚》的主题是批判和否定张大哥之流的敷衍、卑琐、灰色、庸弱等精神弱点和生活态度；《四世同堂》则让祁老人等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性格的守旧、苟安、怯懦等精神弱点在民族的灾难中备受惩罚。《猫城记》在完成上述主题上，应当说更直露、更激烈、因此令人感到更痛切。它至少尖锐讽刺了一般人的下述几方面弱点：第一是麻木不仁。他们以观赏态度看爱国者大鹰被示众的头颅；自己挨了打不思反抗，反而笑嘻嘻，好象脑袋专为挨打才长的。第二是守旧、妄自尊大。他们老是以自己是“一切国中最古的国”的一分子骄人，不管自己实际上如何不学无术，只要“第一”就好，正如阿Q的自以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感到无上骄傲一样，他们把自己的蛆虫也视作珍宝，对外国的一切，哪怕是好的，也不屑一顾；即使偶而接受某些新事物，但“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长了白毛”。第三是敷衍苟且，卑怯自私。猫国一切都处在苟安、卑怯、糊涂之中。

“上下糊涂，一齐糊涂，这就是猫国的致命

伤”。“负责”在猫国是个被讨厌的词，人人都在“敷衍”；以礼待人，会遭歧视，“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也是下等猫人认为正当的态度”。和善问话，没人理；稍一恐吓，立即什么全说出。他们自私，自私到踩死同胞都无动于衷。他们欺负弱者犹如阿Q的调戏小尼姑；而对强者则伸上脑袋任人打。第四是不团结。他们互相残杀、抢迷叶成为“正当事业”。三五个猫人在一起不打架是不可能的，甚至被异族入侵者抓住，只剩下两个猫人被关在笼子里还要互相咬死一个。第五是只会空喊口号，而不务实际。还有不讲卫生、盲从、无半点国家民族意识，等等。

《猫城记》所描写和批判的这些国民性弱点，是一切有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的人们不能不感到痛心、愤激的。作家意图十分清楚，他不是故意宣扬“家丑”，而是真切想要从国人的意识领域中涤除掉这些精神垃圾，以促进新的国民性格的成长，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他确实没去写腐烂的肌体的新生一面，在讽刺这些落后东西时，无疑也是夸张了一些，重了一些，但不因此也更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吗？评论家李长之在《猫城记》刚一问世时，就对老舍的描写、看法深表同情，不是没道理的。

上述两方面是《猫城记》的主要思想成就。从思想内容上看，小说有没有缺欠呢？我认为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把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评价《猫城记》扭到文化、思想角度去评价，可以，但角度变了，问题还是存在。假使《猫城记》不涉笔先进的、革命的社会力量，它不失为一部有力的现实主义讽刺作品。不写革命，完全可以；但是写了，而且写的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或者只见皮毛、局部，而不看本质，

全局，这就是不能不引人注意的大毛病。批评家再客观，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出发点或立场。所以，尽管从全书主导思想倾向看，对先进社会力量的描写毕竟是小枝细节，不必把它看得太重，而且在那形势复杂多变、政治的雾雨时时弥天的三十年代中，各阶层人物对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组织 and 力量一时认识不清或误解，甚至有过微词的人何止万千，然而《猫城记》毕竟是有这样的缺欠存在。

故意躲过这个问题是不客观的；把这个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其结果是使小说三十多年遭受冷眼；新时期以来重新予以评价时又曾有一种意见对此作过不必要的辩解。例如说，小说对“大家夫司基”的描写不是讽刺共产党及社会进步力量，而是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还有人说作品中的“大家夫司基”等所指也包括国民党在内，“红绳军”是指国家主义军队等。

我觉得这些辩解是无力的。应当说《猫城记》中所讽刺的某些人的只会空喊口号，只会搬弄新名词吓唬人的现象在三十年代社会生活中是存在的，老舍这样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现代史》的杂文，内容是讲中国现代史好象是变戏法，昨天你在台上，向人民勒索钱；今天他在台上，仍然需要那套猴了戏，照样向人民聚敛，如是而已。假使执意要指责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诘问鲁迅先生，现代史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写下不朽诗篇，人民的斗争也是接连不断的，你怎么只看到几个政客你上我下的“变戏法”呢？岂不忽视了社会本质力量的存在？一篇文章的包容量总是有限的，作家行文的视角巧妙也因人物而异，谁如果那样幼稚地去提出上述问题，谁便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同样，《猫城记》的主要任务是通

过讽刺达到目的，它所寻找选择的是社会的落后面加以鞭笞，而不是去歌颂和肯定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不应责备它没有从腐烂根底里看出新的生机来。这部作品是老舍对多少年中国政局和民情的直观的表现和感情发泄，他失望于他所接触和看到的一切（包括从书本上得到的一部分），因此便一律加以贬斥性的描写，包括他还未来得及认清的共产党。这一点无须讳言或辩解。老舍个人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已有充分理由说，那时老舍对革命和共产党的讽刺是在不自觉立场上进行的，与那些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侮蔑革命的资产阶级文人有着质的不同。正是由于这一出发点的差异，使老舍在一且认清以后，才那么坦诚地自我批评，并忠贞不二的跟着共产党走。

老舍在他的创作中并不是不想寻找和表现新的社会力量。他在初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都作过这种努力，但都不够成功。在《猫城记》中同样反映了老舍企图寻求民族新生的思想矛盾，这表现他对人格、教育、国家富强的关系看法上，照小说表现的可见，猫国社会，因为缺乏教育，造成无知识无人格；而无知识无人格又破坏了教育。要提高人格知识，就要办好教育；而要办好教育又需先有由高尚的人格组成的社会。那么到底谁因谁果，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老舍回答不准。于是思想走入了绝境，猫国也便没有希望了，好的、坏的“全要回归于尽”。造成这种思想迷途的原因，正在于此时的老舍对群众斗争、对于猫国社会改革和进步所必须采取的方式——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缺乏了解和认识。

由直观得来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现实主义态度，帮助他真实地揭露和鞭挞社会

黑暗、丑恶时是生动、充满血肉的；而不善于从政治上、从时代高度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想局限，又使他在企图提出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改革主张时捉襟见肘，甚至在表现上出现偏颇和失真。一个有时量的长篇小说，应对时代的本质面貌有较准确深刻的反映，而要达到这一点的首要前提是作家必须对社会作总体认识，能够较深刻地观察、分析和把握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力量及其内在联系。写《猫城记》时的老舍还不具备这一点，作品思想的深度受到限制以及瑕疵的存在也就不难理解。

### 三、从思想与艺术的统一 上看《猫城记》

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融教育、认识、审美和娱乐价值于一体的。通过可感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生活、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感染读者，这是文艺作品的最基本特质。正象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人们于政治、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外之所以还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是艺术，具有别的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形象性特点。文学如果一旦失掉了艺术性，正如斧子没有了刃，你仍称它为斧也未常不可，但它已失去了斧子的功能。还有，经典大师曾经在谈论创作时强调反对“席勒化”，要“莎士比亚化”，也同样是注意了文艺的情节丰富性和形象性特征。否则，也就难以创作出经世的作品。

老舍是深通创作三昧的大作家。他从《老张的哲学》开始的大部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无不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但《猫城记》却有些背离作家自己的传统：他太急于直接宣泄

自己的感情和对社会人事的理性认识和思考，而忽视了文学的形象塑造，忽视了倾向不要特别的说出，要反对“席勒化”的弊端，要倾向从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发展中自然流露出来，一些人物只有名字，而无实体，变成宣传个人观点的“号筒。”我觉得这部作品之所以还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不是由于形象成功，更不是由于情节的生动，而主要是靠老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奏了效。假使不是这位语言大师的极富魅力的文学语言来补情节贫乏、形象干瘪之拙，这部作品则很难令人卒读完篇。

再从文体上看，《猫城记》既不是什么科幻小说，因为它没有多少幻想中的科学特点，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转移；它也够不上童话境界，因为童话要求诗意、想象，而《猫城记》太实际；它倒可算作一部不甚成功的寓言讽刺小说，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写社会，但也有些失之太直太露。我以为评论家李长之之论是公道、合乎实际的：它象个漂亮的通俗日报社论，或者还算是一部成功的化妆讲演。<sup>②</sup>正因为《猫城记》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之间的间距太大，未得和谐统一，从接受美学来看，它也就很难在更广更深程度上征服读者。人们受感染的力量不是来自丰满形象自身，感兴趣和争议的不过是从出自各人理性思考而发的个人之见而已。巨大的思想内容未得在和谐的艺术表现中显现出来，常常是借助人物之口宣之于世，这就使《猫城记》没法不“软”，如作者所说，它成了一个折了翅膀爬在地上飞不起来的鸟<sup>③</sup>。

一个作家总有所长，也有所短；扬长，可以发挥优势，避短才能不捉襟见肘。老舍所不擅长的，或者说应当避免的“短”，恰恰在《猫城记》中大大扩展

了，而他擅长的，或者说他具有的优势，在小说中反倒多所收敛，这恐怕也是《猫城记》未能尽如人意的一个原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注：

①鉴于一时对《猫城记》评价过高，唐费在1982年《文史哲》第5期撰文指出，《猫城记》“是一部有缺点”的作品，“他影射革命政党”，他不可能批评王明“左”倾路线，“如果说他在生活里感受到那些实际的东西，他也认为这是革命政党的问题，而不是王明的问题，不能说 he 批评的是王明。”

②参[网苏]安琪波夫斯著《老舍的早期创作》

中有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末永毅译文。

③⑩《我怎样写〈猫城记〉》，见《老舍论创作》（增订本），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④《我怎样写〈离婚〉》，见《老舍论创作》（增订本）。

⑤《鬼曲》附记，1934年《现代》杂志第5卷第5期。

⑥⑦⑧⑨见《老舍论创作》（增订本）。

⑩⑪李长之：《〈猫城记〉》，1934年1月《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

⑫见《鲁迅全集》第5卷，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牟进）

· 古风今鉴 ·

## 包拯家训<sup>①</sup>

赵立纲译注

〔原文〕包孝肃公<sup>②</sup>家训<sup>③</sup>云：“后世子孙仕宦<sup>④</sup>，有犯赃滥<sup>⑤</sup>者，不得放归本家<sup>⑥</sup>；亡殁<sup>⑦</sup>之后，不得葬于大茔<sup>⑧</sup>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sup>⑨</sup>又云：“仰珙刻石<sup>⑩</sup>，竖于堂屋东壁，以诏<sup>⑪</sup>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简注〕

①本则选自《能改斋漫录》。包拯严明的家训，实际上是严以律己的延伸和扩大，反映了他正直无私、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②包孝肃公：即包拯。姓包名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官至枢密副

使，以执法不阿而著称。逝世追谥孝肃，故后人尊称之为包孝肃公。③家训：在家庭中长辈对晚辈的训导之词。④仕宦：做官。⑤赃滥：贪污。赃，贪污的财物；滥，贪。⑥本家：老家。⑦亡殁：死亡。⑧大茔：坟墓，此指祖茔。⑨押字：在文书上的签字。⑩仰珙刻石：希望包珙刻成石碑。仰，切望，旧时公文用语。⑪诏：告知，晓示。

〔今译〕包拯在家训中写道：“我的后世子孙，凡在外做官有贪污行为的，不允许他再回到老家来；他死了也不能葬入祖茔。谁违背我的意旨，谁就不是我的后代。”一共是三十七个字。在家训末尾的签字处又写着：“切望包珙把它刻成石碑，竖在家中正房的东墙上，以便让后人都知道。”又有这样十四个字。包珙，是包拯的儿子。

· 93 ·